



论
语

国学经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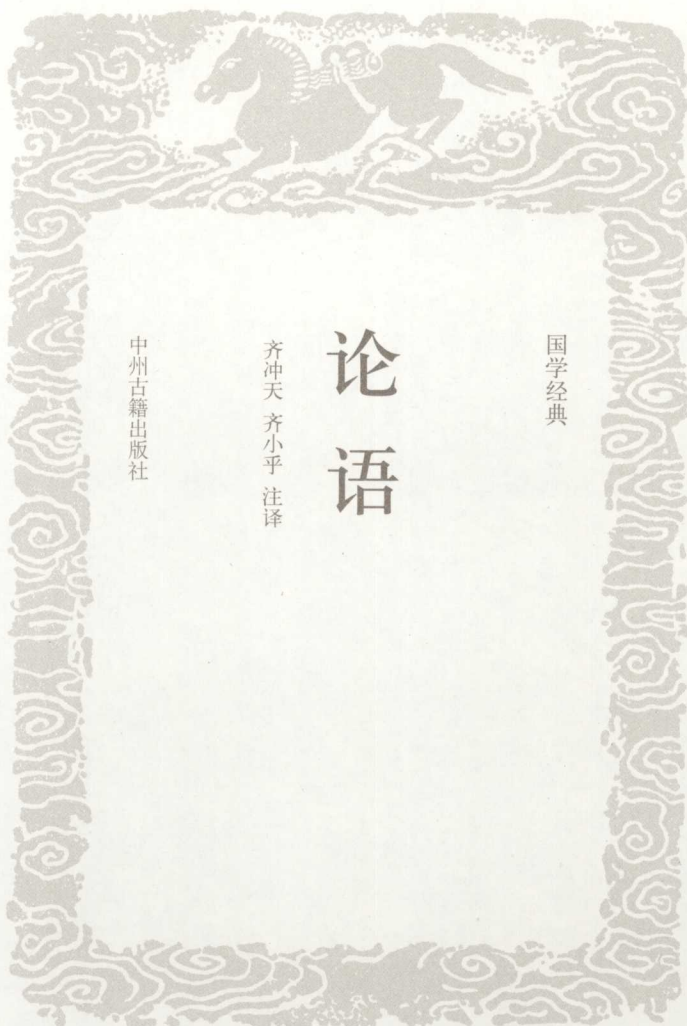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国学经典

论语

齐冲天 齐小平 注译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/齐冲天,齐小乎注译. - 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
2008.1

(国学经典)

ISBN 978-7-5348-2845-4

I. 论… II. ①齐…②齐… III. ①儒家②论语-注释
③论语-译文 IV. B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1326 号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开本:640mm×960mm 1/16 **印张:**18.25

字数:213 千字

印数:1—5 000 册

版次:2008 年 1 月第 2 版 **印次:**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3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论 语

序言

——关于孔子和《论语》

一、《论语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

《论语》就是孔子的论和语。论就是议论，语就是告知，使人有所觉悟。总之，它不是一般的说话，是学术理论。过去把周秦时的散文，分为记事与记言，《论语》当然是记言的了。但是其中第十篇《乡党篇》记载孔子的生活情况和言行风貌，那就是记事的了。

《论语》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作的记录，有一部分没有问，就是记下孔子的言论，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、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，还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是孔子弟子回答别人的言论，如《子张篇第十九》共二十五章就都是子张、子夏、子游、曾子、子贡的话。自来有所谓“语录体”，这便是典型的语录体。没有许多的上下文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说完为止；而且有话也没有长篇大论，即使题目很大，也是大题短论。《论语》中最长的一章该是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章，也不到五百字。最短的只有六七个字，如“子不语：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便是七个字。所以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（1713~1784年）感到孔子学说简洁可爱。孔子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、思想家、世界的文化伟人，总共也就留下了几百段语录，集中收集在《论语》里。还有一些散见在

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等书中。

《论语》总共二十篇，不到五百章。因为《乡党》等篇中各个版本分章不同，稍有出入，故分为四百几十章不等。但是各章先后的顺序，大家都是一致的。至于最初编纂这本《论语》的人，他把哪一章放在哪里，有没有讲究？小的讲究有，大的讲究看不出来。例如往往有些内容相近的章，编在一起，如孔子遇见隐者的对话共有六章，编在两处，没有更分散，也没全在一起。《子张》篇都是弟子们的言论，但还有一些篇里也夹杂一些弟子的话。为什么要分二十篇，每篇为什么是那么些章，都看不出名堂。每篇的标题取各篇第一章的头两个字，也不成意义。所以，四百多段语录只是很松散地罗列着；而且，还有几章是前后重复的。两千多年来的读者和研究者，谁也没有去编一本归类而有顺序的本子。就是这样一个无体例的体例，各自可以自由地去互相联系，互相发明，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学说的整体。宋代的宰相赵普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，另外那半部呢？似乎丢掉了也不要紧。不在篇章上下工夫。着重的是去实行，一个字也可以做一辈子，几百章书是“一以贯之”的，所以缺了半部也不要紧。至于《论语》的编录者是谁，当然是许多弟子们去干的了。要记录几十年里在各个地方说的话，自然要由许多人来完成这项工作。大家记录以后，汇总起来，当年曾在鲁国、齐国等流传着不同的本子。这样，它的编者也就不是出于一人之手。细心的读者发现，书中对孔子的弟子都称字，如子张、子夏等，唯独对曾子，就始终不称子舆，十七次均称其姓，尊称为“曾子”，这就露出了马脚，曾子的学生是《论语》的编纂者或主要编纂人。还有对有若，《论语》中四次称有子，两次称有若，则称有子的地方是有子学生所记。杨伯峻先生说，《论语》中年代最晚的一章书应该是8.4章曾子临死前回答孟敬子的一段话。曾参又是孔子弟子中最年轻的，比孔子小四十六岁，曾子活到七十岁，那么记载下这段话，又编进《论语》中去，自然就是曾子的学

生在孔子去世四五十年以后所干的了。

荀卿（前 313 ~ 前 238 年）无疑是个熟读《论语》的人，他在文章中经常就孔子的观点来作发挥。他的中青年时代离曾子临死前回答孟敬子那段话的时间，大约是一百五十年，即离《论语》成书的时间不远了。我们发现《荀子》的第一篇《劝学》与《论语》的第一篇《学而》相同，都是以学习问题开卷，《荀子》的末篇《尧问》与《论语》的末篇《尧曰》相似，都是以尧的话题收卷。这不像是个偶合，像是荀子有意安排的一个编纂意趣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感到，荀子当时读到的《论语》跟我们现在的《论语》，应该是大体差不多。

《论语》全书一万二千七百多字，过去的人是背得很熟的。由于书中句子短，语气词多，我们能感到在记言的时候，书中还保留了浓厚的口语风格，只是在后人读来，它已经成了诘屈的古汉语。《论语》的语言，以口语为基础，还需结合许多学术概念、政治用语、史籍词句，还有许多哲理性的语言、文艺性的语言。这样，它就不可能像一般的群众口语，我们也不应要求一位博学的学者只讲些群众语言。

《论语》一书的主要内容，就是仁义道德。这也就是孔子学说的核心、儒家学派的主导思想。书中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仁义道德，从个人的思想修养、为人处世到国家社会的治理。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，还有历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论。他们那时不分学科，不排课程，各人发挥自己所长，因材施教，提出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。所以《论语》一书的内容是很广泛的。

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、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（1694 ~ 1774 年）读了《论语》的二十篇后说：“它们都是讨论善政、道德及美事，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，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。”（《中国君主专制论》第 591 页。转引自德国利奇温《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

的接触》第94页，1991年商务印书馆。）

《论语》担负着一个时代的使命，就是要回答如何改变春秋末年我国社会这种混乱分裂的局面（即“天下无道”）及到哪里去寻找出路的问题。这也是春秋战国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一个中心议题，大家都在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来。思想主张，在学派那里；行政大权，在诸侯手中。看谁跟谁结合起来，开创时局。

二、孔子学说的由来

我国自周文王、周武王大批分封诸侯，到孔子之时，经历西周而东周，如司马迁所述：“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”这五百年以后，变成了个什么样呢？一个主要的事实就是周天子大权旁落，一个显赫的统一的东方大国，变成乱糟糟一锅粥，如16.2章所说：政不再自天子出，而自诸侯出、自大夫出，甚至陪臣出。我们借用《史记》中武安侯的一句话来描述它，叫做“枝大于本，胫大于股，不折必披”。意即树枝比树干粗，小腿比大腿粗，纯属怪样，不是折断，便是裂开。时代到了那一步，主要毛病还是出于统治阶级上层，出于他们自己内部。这小腿就是春秋五大霸，还有几个小霸，他们轮流坐庄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政治上争霸权，经济上争土地，强凌弱，大兼小。小腿下面还有小腿，也在膨胀，如鲁国的季氏，齐国的陈氏，晋国的赵氏，等等。他们在思想文化上就是荒淫无度，残暴腐朽，礼崩乐坏，道德沦丧。那还是春秋初年的事了，孔子也是知道的：鲁国的惠公看见他儿子的妻子长得好，就“自妻之”，即把儿媳妇也占为己有了，还像个样子吗？这还是周公的后代哩！《左传》一书中，一切乱伦之事，父子兄弟无情残杀之事，无奇不有。卫国是儿子跟父亲打仗，子路还在中间起了大劲。还有春秋时代那些暴君，像晋灵公之流，残忍冷酷，以杀人为儿戏，哪儿还有一点仁爱之心？所有这一切，丑闻迭起，都被孔子一个“讳”字全部抹杀了。要为尊

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，一切腐败，一笔勾销。

孔子的思想，一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。写文章可以讳，研究问题就不能讳。根据这种情况，他认为还是要以仁义道德治天下。这是尧舜、禹汤、文武以来的良好传统。孔子以仁义道德为主旨的儒家学说，诞生在仁义道德严重败坏的时代。

德治是三代以来的传统政治，如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施实德于民。”《尚书·泰誓》：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”又如《诗经·相鼠》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”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”但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里没有这种政治的理论，只有一些基本的观点，一项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建设工作，就落到孔子的肩上了。孔子出身于以周公为始祖的鲁国，那里较多地保存着周朝文化，而孔子也是以周文化的代表人自居，如7.22章所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文、武之道没有失传，还在人间，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孔子到处都可以学到文武之道。对于孔子个人来说，他生在鲁国国都曲阜，他自幼就是一个好礼的孩子。由此可见，一切条件都具备了，历史给他提供了这个良好的机遇。

孔子并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理论大著，如上所述，就是语录数百条。全是口头上所说的，说多了，弟子们记不住，子路的脑子就跟不上：“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又闻。”但是这许多语录总起来看，却还是成体系的。它把仁义道德贯注到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各方面，贯注到每个君子思想修养的各方面，如人生观、伦理观、道德观、社会观、审美观，等等。诸侯、大夫都做到了，每个君子都做到了，这国和家就都不愁了。

三、孔子的思想

春秋战国时代，学术思想界百家争鸣。他们有一个共同之点，各自都称自己的学说是“道”。道家当然要论道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

儒家也说他们追求道，孔子说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。法家也说“法之为道”（《韩非子·六反》）。兵家说“知道，胜”，“不知道，不胜”（《孙膑兵法·篡卒》）。那么，道又是什么呢？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道，所行道也。从辵，首声。一达谓之道。”道从首声，是声中有义的，首作动词，谓头之所向，故有引导、向导之义，正确的导向只有一个，故曰“一达谓之道”。然而百家争鸣，便不就有“一百达”的“道”了吗？既然是导向问题，那便具有前瞻性和远见性，是理想化的。当时，那么多的诸侯国，一打就是几个世纪，要打到什么地步，将打出个什么名堂来，时代的出路何在，百家争鸣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课题上展开的。

孔子活动的年代是春秋末期，七国对峙又经历二百多年，他没有见。史载有近千个诸侯国，兼并成五个，这二百多年，他见到了，最后三家分晋，变成七国。所以，孔子尽管继承了周公等的学说，他也不去怀念或拜见周天子了，他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在诸侯国政治的基础上求出路，谁能“为政以德”，他便可以征服天下，而不是以武力征服。所以他说“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”。这是个比喻说法，很难要求它的准确性。就比喻说，千里马若是没有力，还叫什么千里马呢？千里马的德就更不存在了。但是孔子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，他不可能治国而无视实力，他说要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”（12.7）。这不是把粮食和军队放在前面吗？所以，他只是说不要去炫耀实力，而是要称赞道德。但是仅这一点，在那个漫长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时代，也是很不好办的。

孔子学说的重点，是在思想意识方面。《论语》中对生产和军备问题只是说要“富之”，要“足食足兵”，一带而过。比如老子，他的军事哲学思想就很高明，商鞅更是正面地谈论耕战，作为行政的首要问题。

孔子谈思想意识，上自国家的意识形态，下至每个君子个人的思

想修养和生活作风，无不说得精细入微，既有原则，又切实可行。他要求他的学生每个人都一言一行，照此办理，而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。他招收学生号称三千人，其中贤人七十二个。他培养的君子，都要求是治理诸侯国家的人才。他不要求学生去学习种谷种菜，认为那是平民百姓、小人物的事，学生们应该去当君子，学会以仁义礼乐治好一个诸侯国家，从而赢得全天下人的归附和向往，再现一个周初文王、武王时代那样的一个礼仪大邦。

那时代国家的意识形态，主要是要忠实于这个专制帝国，君子都在为它效力。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（14.1）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（8.13）孔子把君子的命运与邦国的命运完全挂靠在一起。义和利，要见利思义，见得思义，这是儒家的名言。不义之财，不取也，要能够甘于贫困，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”（4.9）。道与君是一体的，孔子对待国君，总是毕恭毕敬的，“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”。他也不怕别人讥笑。但是孔子认为他是出生在一个无道的时代，“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”（18.6）。他没有退隐，而是积极争取时机。

孔子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性，是终身不衰的。“死而后已”这句话，始见于《论语》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8.7）这实在是一个政治家的人生观，是坚定而不平凡的。孔子是一个十分勤奋而机敏的人，他反对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，一个人总要有所作为，“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”（9.23），“君子病无能焉”。他经常反省自己，一是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”。二是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。他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。在言和行的问题上，他也有很精到的见解，他要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。又说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（14.27）。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南容，由孔子做主把一个侄女嫁给了他，出于两点理由：一是说他

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”（5.2）。二是“南容三复‘白圭’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”（11.6）。是说南容把《诗经·白圭》的两句诗念了又念，就深深地打动了孔子的心，那是两句什么诗呢？“白圭之点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点，不可为也。”是说白玉上面有了污点还可以把它磨掉，人们在言谈中有了污点，就没法办了。这样，这位南容从大处到小处都经得起孔子的推敲。看来，娶到这位侄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孔子对人的主观能动性，作了充分的估计。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，吾德也。”（9.19）意思是事业的成败全在自己。为仁由己。吾欲仁，斯仁至矣。孔子的学习精神十分顽强，是一般常人所不及的。他在学与习、学与思、学与仕、温故与知新等的关系上，都有很好的见解。知识是积累而得的，“日知其所无，月无忘其所能”。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（8.17）。他感到在学习上总好像是赶不上人家，感到生活在社会中，随处都可以有学习的，大至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小至一举一动，非礼勿视。他的学习，大多是向现实学习，《论语》未见有哪个时候说孔子搬了一堆竹简、木简在看书，或者是伏案写字，师生们侍坐的时候谈古论今，或是述怀，一切都在心上或是嘴上。《论语》中也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，都是脱口而出。

孔子的学说中，充满情意。他说仁就是要爱人，又说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”（12.16）。君子都应是一个好心肠的人。要“汎爱众，而亲仁”（1.6）。那是一种胸怀广大的爱。当然他也有厌恶，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”（4.3）。他又说从政要有四恶（20.2）。这样，他的爱与恶就完全与仁、与政结合在一起了，这就超越了一般常人的好恶，而赋予了深刻的内容。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心是沟通的，他了解和尊重他们各人的个性，然后从严要求他们。像子路这样好勇的人，对于内心的修养，沉潜涵泳，终究也不在行，但是

他能终身追随、护卫着孔子，他是心悦诚服了的。

孔子对于自己的思想认识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。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（2.17）这是一句至理名言，简单而又深刻。人们的确总有一部分认识是处于半知状态，是蒙昧的、朦胧的，是属于知还是不知呢？要明智地分清这个界限。比如鬼神的事，不知就不语，或者敬而远之。又如“道听而途说，德之弃也”（17.14），你也应该心中有数，要“视思明，听思聪”（16.10），至于好胜、强辩之类，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子路就有这种缺点，孔子在子路身上总结出了这样一句名言。孔子离开现在已经有二十五个世纪，那时的科学是什么水平？虽然已经不是“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却也还是“五畝之宅，树之以桑”，是小农经济的发展时期，《论语》中的许多警句，至今都是富有教益的。孔子那种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，是两千多年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同程度地信守的。

孔子的心态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叫“君子坦荡荡”，他不忧不惧，因为“内省不疚”，即没有亏心事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。若要说忧的话，那就是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”（7.3）。他感到人生是勤奋而快乐的，是乐以忘忧的，即是后来说的乐观主义。一个人生活在如此复杂的世界里，他谦虚、恭敬、诚实、礼让，以之为美德，这既是明智的，也是科学的。这不是弱者，仁者是刚毅（13.27）的，他任重而道远，不是一个刚毅而能持之以恒的人，怎么能够担当得起来？

孔子对于人民，不可能没有偏见，如说民斯为下、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“民主”一词，《尚书》中就已有了，它的含义是：民之主宰者、父母官为民做主，而不是人民做主。孔子对民有一般的泛爱，他不能失信于民，“民无信不立”，他的政治要使“近者悦，远者来”（13.16），要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（20.2）。总之，要使民信服，国

家才能协调。所以，那是阶级社会里的一种开明政治的思想。至于他的仁，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”（14.6）。人民只是迫切地需要仁，他们和仁义之间那道界限则是不可逾越的。不过历来人们称道他这一点，即孔子办学招生的时候，是“有教无类”的，是把教育办到民间的开始。《论语》中还说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（7.7）“选举”一词，周秦时也已有了，它的含义是：上面去选贤，然后加以提拔，而不是人民投票。“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（12.22）像皋陶、伊尹这样的仁人、君子，照孔子的说法，他们在群众中也不该是小人之辈，因此他所说的小人是指耕稼的普通劳动者。他们在接受教育和社会管理上的确受到极大的限制，他们不可能有现在所说的民主和选举的权利。那还正是一个专制政治的开始和发展初期，没有忠君思想才是不可理解的。

最后还要谈谈孔子所说的天命是什么？他说他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这老天之命岂是他人间的孔子所能知道的呢？既是不知，那就不知为不知，怎么能说五十岁就知道了呢？孔子反复讲信，他绝不会骗人。他两次强调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所以我们应从整个《论语》的思想来理解。《论语》中还十次讲命运。这命或天命就成了理解孔子思想的一个疑难问题。杨伯峻说：“孔子是不是宿命论者，我尚不敢论定。孔子所谓的天命究竟是什么，也很难臆测。后来的人虽然谈到很多，未必符合孔子本意。”这就提出了问题，杨先生也是取了不知为不知的态度。我们基本同意今人李泽厚在《论语今读》中的解释。李说：“我远非钟爱此书（指《论语》），但它偏偏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‘心魂’所在。”既然不钟爱，只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它，那就会说得慎重和客观了。“最难解的是‘知天命’，似可解释到五十岁，自己对这偶然性的一生，算是有了个来龙去脉的理解和认同。”（该书52页）他又说：“‘命’者，偶然性也，既非宿命，也非

神意。即使尽力而为，也总有各种不可抗御、不可预测的偶然，人生常如此，只有深深感慨而已。”（152页）其实，岂只是偶然性，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也常常是很有限的。比如孔子对君主专制的前途有多么深刻的认识，也很难说。不过是五十年下来，对人生有了一个理解和认同罢了。《论语》的最后一章，孔子还说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李泽厚说：“命也者，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。即人力所不能控制、难以预测的某种外在的力量、前景、遭遇或结果。”君子要充分估计到这一部分因素，才能任重道远而无怨无悔。《论语》中也经常说天，3.13章中说“获罪于天”，朱熹在那里注曰：“天，即理也。”至今我们还往往说天理难容，并不就是神意。总之，《论语》中确是看不到宿命和神意的影踪，我们应看清孔子思想的本来面貌。这也是孔子思想高明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我们想，问题的讨论也就至此为止了，若是再深究下去，孔子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，他只是说他“不语”鬼神，他对鬼神敬而远之，那是否还有所存在呢？整部《论语》的确是没有神意的，光这一点就足使我们珍视，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有极为良好的影响。

四、孔子的成败

孔子跑了许多诸侯国家，寻求政治主张的实现。三十五岁（前517年）去了齐国，见到了齐景公。三十七岁返鲁，前后三年，没有成功。三十七岁到五十五岁（前515～前497年）一直在鲁国，季氏、阳虎那里不愿去，鲁国国君那里不能去，他没有权。但到五十一岁时，还是做了中都宰，即一个县官，第二年升为小司空，又由小司空升为大司寇，即鲁国最高法官，并代理丞相。干到五十五岁，干不下去了，是自动弃职的。由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（前497～前484年），有十四年时间，奔走于卫、宋、陈、蔡、楚等国，也没有成功。眼看就是晚年了，就回到了鲁国，到七十三岁（前479年）去世。若

是从“三十而立”算起，大约四十年，将近一半时间在外，一半时间在鲁。孔子的政治活动无疑是失败的。退而论道，致力于学术和教育工作，在思想文化上，他大获成功。他成了我国和东亚、东南亚诸国两千年来崇敬的大圣人，当今又成了联合国颁布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。不过孔子的学术工作主要不在书斋里进行，学生侍坐的时候，接待客人的时候，诸侯的朝廷上，赶路的马车上，甚至畏于匡、困于陈蔡的时候，都是他发高论的时候。

孔子的学说对不对呢？

从长远来说是对的。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主要是在儒家学说的推行下取得的，这是个基本事实。那就是在和平时期，尤其是发展时期，例如汉、唐这两个封建社会的高涨时期，汉武帝宣布“独尊儒术”，唐太宗宣称“酷爱儒学”，那也就是儒家学说的风行时期。宋代和清代，学术思想活跃，也就是儒家学说深入而有进展的时期。当然，什么时候也都会有儒学的对立面存在，只是它不成为主要的方面。

但是在孔子当时的社会，他的学说就行不通。那是一个阶级斗争持久地处于激化状态、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的时代，社会各方面都处于动荡、分化的时代，谁还顾得上去讲究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道德？有几个人肯接受礼的约束？齐景公、卫灵公和楚昭王，一时都曾想试用孔子这把宝刀。但是，齐景公的耳边，晏婴一打岔，凉风一吹，就拉倒了；卫灵公郊迎孔子，几番谈话，终于话不投机，最后孔子自己走人；楚昭王更是兴师迎孔子，可是令尹（即丞相）子西一席话，主要是说孔子师生要振兴周公、召公的事业，那么楚国不过是子男五十里，能像现在这样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？所以王若用孔子，非楚之福也。昭王也就罢休了。表面上看似乎都是三位诸侯一念之差，实质上是不能接受孔子的主张，即使接受了，也早晚是弄不成。只是在鲁国，已经当了代理丞相，可以一展身手了，何必因为齐国送